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 中国外贸发展

QUANQIUHUA SHENGCHAN ZUZHI KONGZHI YU
ZHONGGUO WAIMAO FAZHAN

洪联英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长沙理工大学学术著作 · 184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 与中国外贸发展

洪联英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发展/洪联英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5
ISBN 978 - 7 - 5141 - 1844 - 5

I . ①全… II . ①洪… III. ①国际贸易理论 -
研究②企业 - 对外贸易 - 生产组织 - 研究
IV. ①F740②F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8396 号

责任编辑：李 雪

责任校对：王苗苗

技术编辑：邱 天

全球化生产、组织控制与中国外贸发展

洪联英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编辑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1000 16 开 13 印张 220000 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1844 - 5 定价：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导论：为什么中国外贸发展增而不强？	1
1.1 全球生产分散化与贸易一体化	1
1.2 中国外贸发展增而不强的典型化事实	3
1.3 一个新的视角：国际生产组织安排	10
1.4 本书的主要内容	15
1.5 本书的结构安排	18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2
2.1 企业内部权力理论	22
2.2 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理论	25
2.3 贸易、FDI与企业组织新理论体系	28
2.4 结论	34
第3章 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分析：理论拓展与框架构建	37
3.1 引言：企业权力视角下的国际生产与贸易	37

3.2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企业权力内涵及权力关系	40
3.2.1 权力含义及质的规定性	40
3.2.2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企业权力内涵	41
3.2.3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企业权力关系	44
3.3 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理论：一个新拓展	46
3.3.1 来源于物质资产的企业权力——企业所有权	46
3.3.2 来源于组织机制的企业权力——企业进入权	48
3.3.3 来源于无形资产的企业权力——企业链接权	49
3.3.4 企业权力体系与贸易、FDI组织方式	53
3.4 权力机制协调全球生产与贸易活动的必然性	55
3.5 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分析：	
内容框架与分析范式	57
3.5.1 内容框架：双重解读	57
3.5.2 分析范式：企业权力约束与市场机制的整合	58

第4章 企业所有权安排、贸易组织结构与中国外贸失衡：

以美中贸易逆差为例	61
4.1 引言	61
4.2 关键概念与理论基础	63
4.2.1 企业所有权与贸易组织结构的内涵	63
4.2.2 一体化的均衡分析方法	65
4.2.3 GHM 产权理论与贸易、FDI 理论的融合	66
4.3 基本模型	67
4.3.1 禀赋与偏好	67
4.3.2 生产、技术与贸易	68
4.3.3 不完全契约与企业所有权控制决策	68
4.4 企业所有权安排与贸易组织结构的均衡选择	70
4.4.1 企业行为与所有权安排	70

4.4.2 贸易组织结构的均衡选择	71
4.5 中美贸易失衡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73
4.6 美中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经验分析	77
4.6.1 分析方法	77
4.6.2 数据来源与处理	79
4.6.3 计算结果与经验分析	80
4.7 结论与启示	86
第5章 企业进入权控制、专用性投资与中国贸易比较优势的被动效应	89
5.1 引言	89
5.2 基本模型	93
5.2.1 假定条件	93
5.2.2 企业组织行为与进入权控制	94
5.3 进入权的组织控制与供应商的专用性投资激励	95
5.3.1 进入机会控制、市场结构与事前定制投资	96
5.3.2 进入权机会控制、转移支付与事前分摊投资	99
5.3.3 进入权数量控制与供应商的事后专用性投资	100
5.3.4 均衡	101
5.4 企业进入权控制与南北贸易比较优势的被动效应	103
5.5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验例证	106
5.5.1 方法与数据	106
5.5.2 对进入权控制机制分析	107
5.6 结论与启示	110
第6章 企业链接权控制、层级租金与中国外贸贫困化增长	113
6.1 引言	113
6.2 链接权约束下的国际生产与贸易模型	115
6.2.1 偏好与需求	116

6.2.2 国际生产、不完全契约与企业链节分解权	116
6.2.3 贸易、销售与支付	118
6.3 链接权的能力控制与层级租金分配	119
6.3.1 链接权控制下的企业行为	119
6.3.2 讨价还价与层级租金分配	120
6.3.3 均衡	123
6.4 企业链接权控制机制与贸易增长模式的分化效应	124
6.5 经验分析：以中、韩、美三国为例	129
6.5.1 分析方法	129
6.5.2 数据来源与处理	131
6.5.3 计算结果与经验分析	131
6.6 结论及政策含义	136
第7章 垂直专业化、层次结构与中国外贸发展模式依赖	139
7.1 引言	139
7.2 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权力的层次结构特征	143
7.2.1 企业权力的空间结构特点	143
7.2.2 企业权力的层次结构	144
7.3 企业权力的层次结构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层发展假说	146
7.4 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层发展的经验分析	149
7.4.1 变量设置与模型	149
7.4.2 样本选取和数据处理	153
7.4.3 计算结果分析	154
7.4.4 其他经验支持	158
7.5 结论与启示	160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164
8.1 总结	164

8.1.1 国际生产与贸易中的企业权力理论	164
8.1.2 跨国企业权力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的影响	166
8.1.3 跨国企业权力的层次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外贸 发展的影响	167
8.2 政策主张	169
8.2.1 对策与调整战略	169
8.2.2 配套政策思路	174
结语：构建中国国际生产组织理论的几点思考	177
1.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	179
2. 跨国并购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180
3. 本研究领域的改进	181
参考文献	182
后记	199

第1章

导论：为什么中国外贸发展增而不强？

1.1 全球生产分散化与贸易一体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将生产过程分段（production progress fragmentation）比生产一体化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型企业纷纷“减肥”，把原本垂直一体化的产品生产过程分解为不同的工序和区段，在空间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形成了不同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的工序和区段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琼斯和凯尔科斯（Jones & Kierzkowski, 1990）较早地把这种“生产过程分离开来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为“国际分段化生产”（international fragmented production）。对于这一新经济现象，不同学者都有不同描述^①。由于尽管这些表述角度各

^① 类似的名称还有：价值链切片（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Krugman, 1995）；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Arndt, 1997）；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Antweilier and Treffler, 1997）；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Feenstra, 1998）；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Hummels et al., 2001）；生产分享（production sharing）（UNCTAD, 2002）；外包（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 2005）等。

异，内涵也不尽完全一致，但总体上都包含了“生产过程分离开来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特征，我们将之称为“全球生产分散化”（fragment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面对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芬斯阙（Feenstra, 1998）挈领式地指出：“世界市场一体化的上升带来了生产过程的非一体化，使得国外的制造或服务活动与国内的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琼斯和凯尔科斯（2001；2003）也深刻地指出，“这些分散化的生产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模式”，由此引致的全球贸易流量和性质的深刻变化，是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不同于19世纪兴起的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说，全球生产分散化与贸易一体化相互促进互为条件，构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一方面，全球生产分散化形成了跨越多个国家的全球生产贸易链，不仅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性质和方式，而且改变了贸易的增长方式。同传统市场交易方式相比，当代贸易模式更多地转向中间品贸易和一体化方式——大量零部组件和服务要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以公司内贸易形式，要么通过契约外包以公司间外包贸易形式流转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诸如美国商报（The Business Press）强调了与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的国际外包贸易显著增长的事实；汉森、马塔洛尼和斯劳特（Hanson, Mataloni, Slaughter, 2003）记载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情况；斯宾塞（Spencer, 2005）则以1986～2003年中国制造业为例，说明其出口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权式公司内贸易，其余约22%的出口贸易是属于公司间外包贸易。事实上，全球生产分散化不仅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快速增长，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阿杜柯拉拉和山下（Athukorala & Yamashita, 2006）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零部件贸易全球出口额在1992～2003年期间增长了154%，而世界贸易出口总额在同期只增长了108%，前者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后者。而琼斯等人（Jones et al., 2005）的研究表明，在1990～2000年间，全球

GDP 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3.7%，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6.5%，而整个零部件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却高达 9.1%。

另一方面，许多国家贸易一体化尤其是垂直专业化程度（一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促使国际生产变得越来越分散。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 2004），芬斯阙和汉森（Feenstra & Hanson, 1997），坎帕和戈德博格（Campa & Goldberg, 1997），耶茨（Yeats, 2001）等都认为，全球生产分散化之所以会发生，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中间产品贸易。赫梅尔斯（Hummels et al., 2001）和陈等人（Chen et al., 2005）则以 10 个 OECD 国家和 4 个新兴经济体为样本，研究发现，1970 ~ 1990 年间，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垂直专业化的增长比率以及垂直专业化对总出口和 GDP 的增长贡献率都在 30% 左右。而最新的统计则表明，1995 ~ 2000 年间，这一贡献率平均超过了 50%（WTO, 2008）。这些数据表明，最终产品商通过贸易一体化方式，实现了将一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分散开来，突破企业边界，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和谋求市场份额。

由此可见，正是全球生产分散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协作功能要求，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顺应成为一种组织控制和治理力量，促进跨国公司的内部生产经营有效地超越企业边界和国界的限制，将各国贸易投资活动紧密联结起来，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营销和投资的优化配置。

1.2 中国外贸发展增而不强的典型化事实

随着全球生产分散化与贸易一体化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中国凭借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及时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承接了近三十年的 3 次国际产业大转移，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中，成为全球价值链下的重要加工组装供应商角色，促成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

位和外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突出表现在：

(1) 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快速扩张，成为当今贸易增长与发展最快的贸易大国。如表 1-1 所示，1980 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只有 382.5 亿美元，2010 年进出口总额则上升为 29 727.6 亿美元，这 30 年时间增加了 78 倍。进、出口贸易差额由 1980 年的逆差 18.1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顺差 2 955 亿美元，28 年时间增长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外贸依存度由 1980 年的 13.2% 增长到 2007 年的 68%，27 年时间就成为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比重由 1980 年的 0.8% 提高到 2010 年的 9.5%，30 年间增长了近 12 倍。从世界范围来看，1980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排在世界第 22 位，到 2010 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排名第一位，进口总额排名第二位，总排名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表 1-1 1980~2010 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总体规模变化 单位：亿美元；%

年份	GDP 额 (亿人民币)	对外贸易 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贡献度	依存度	占世界 比例	世界 排名
1980	4 517.8	382.5	182.3	200.2	-18.1	0.008	13.2	0.8	22
1985	8 964.4	696.0	273.5	422.0	-148.5	-0.228	23.0	1.8	17
1990	18 547.9	1 154.4	620.9	533.0	87.9	0.040	30.0	1.65	15
1995	58 478.1	2 809.0	1 487.8	1 321.0	167.0	0.080	40.6	3.2	11
2000	89 442.2	4 743.0	2 492.0	2 251.0	241.0	0.033	43.9	3.6	7
2001	95 933.0	5 098.0	2 661.0	2 436.0	226.0	0.035	44.0	4.1	6
2002	102 389.0	6 208.0	3 256.0	2 952.0	304.0	0.047	50.2	4.7	5
2003	116 694.0	8 512.1	4 383.7	4 128.0	256.0	0.027	60.3	5.5	4
2004	136 515.0	11 547.8	5 934.0	5 614.0	320.0	0.029	61.1	6.2	3
2005	182 321.0	14 221.2	7 619.0	6 603.0	1 016.0	0.106	64.2	6.5	3
2006	209 407.0	17 306.9	9 690.8	7 916.0	1 771.0	0.068	65.0	7.2	3
2007	249 529.9	21 737.3	12 177.8	9 559.5	2 618.3	0.086	68.0	7.7	3
2008	314 045.00	25 616.3	14 285	11 331	2 955	0.065	57.6	8.9	2
2009	340 507.00	22 072.2	12 016.6	10 055.6	1 961.1	0.039	45.7	9.6	2
2010	397 983.00	29 727.6	15 779	13 948	1 831	0.032	50.9	9.5	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海关统计资料整理、计算。

实际上，贸易总额从千亿美元迈上万亿美元的大台阶，日本用了 30 年、

德国用了 25 年、美国用了 20 年，而我国只用了 16 年。换言之，我国用了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变成了世界贸易大国。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后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快速，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25%。我国的贸易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的火车头，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美国、日本、欧盟等传统贸易强国或组织，在全球贸易中的作用有了显著提高。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总额对世界整体贸易额增长的作用率在 2005 年就已达 14%；进口总额对世界整体贸易额增长的作用率在 2005 年也已达 8.0%（日本贸易振兴会，2006）。目前，我国进出口总额对世界贸易贡献从 1980 年不到 1% 增加到 2008 年已超过 8%，并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欧盟的第二大、日本和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使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真正变成了现实。

（2）外商直接投资快速攀升，成为增长最快和吸收外资最多的引进大国。自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如图 1-1 所示，1979~1984 年间，我国引进 FDI 总额仅为 41.04 亿美元，但到 2010 年底，我国实际使用 FDI 为 1 057.52 亿美元，30 年中增长近 1 000 倍；实际利用外资占世界的比重从可忽略不计提高到 9.4%；吸收的外资占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总额的 1/4，已经连续 18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首位，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引进国（仅次于美国）。目前我国引进外商投资企业累计达 71 万多家，对华投资企业来自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世界 500 强企业有 480 多家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 40 多家，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吸收外资最多、最具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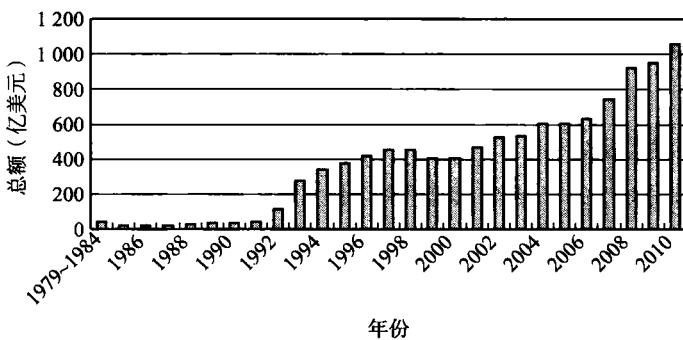


图 1-1 1979~2010 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变化

此外，外贸外资的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 1993~2008 年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每年的 FDI/GDP 增长比率平均达 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 个百分点，每年累计吸收的 FDI/GDP 比率也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

然而，近三十多年来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带给我们的似乎更多像是一种虚幻的经济“神话”，对中国将来的经贸发展产生了扭曲，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却面临严重挑战，突出表现在：

(1) 外贸顺差激增但在国际上却没有话语权，进、出口贸易结构失衡，贸易摩擦加剧，成为全球“两保两反”的遭受大国。我国以初级要素专业化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外资重点流向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制衣、电子装配等行业，使得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低、数量大，不仅冲击原有的国际市场格局，而且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如表 1-1 所示，进、出口贸易差额由 1980 年的逆差 18.1 亿美元增长到 2008 年的顺差 2 955 亿美元，28 年时间增长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即使是在世界经济普遍紧缩、国内外结构大调整背景下，我国仍然保持高额贸易顺差，如 2009 年高达 1 961 亿美元、2010 年高达 1 831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仍然位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简称“两反两保”）调查案件也呈持续上升趋势。1980~1989 年，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件仅为 64 件，平均 6.4 件/年；1990~1999 年，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件为 306 件，平均 30.6 件/年；2001~2009 年，我国遭受的反倾销案件为 537 件，平均高达 60 件/年（见图 1-2）。以 2009 年为例，我国出口产品遭受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9 起贸易摩擦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127 亿美元；其中反倾销 76 起、反补贴 13 起、涉华保障措施 23 起、特别保障措施 7 起。实际上，2009 年我国出口占全球 9.6%，但遭受的反倾销案例却占全球 40.1%，反补贴案例占全球 75%。截至 2010 年，中国已连续 16 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经济体。目前全球 35% 的反倾销调查和 71% 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各项贸易救济案件占同期世界各国和地区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强，名列世界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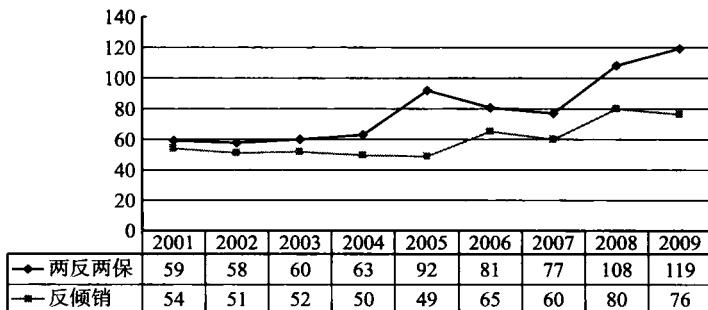


图 1-2 2001~2009 年我国遭受的反倾销及“两反两保”情况

注：两反两保是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其中，2004 年国外首次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

外贸顺差的长期存在，以及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设限”等贸易救济案件，不仅直接导致我国生产者和出口商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而且致使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2) 外贸发展具有“依附经济”特征，没有摆脱比较优势陷阱。大量研究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一是加工贸易的高度依赖。1993~2010 年，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率平均达 55.06%，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平均高达 60.02%，但加工企业始终处于加工组装工场地位，增值率很低，对国内中上游产业带动作用小。二是对引进外资的高度依赖。我国本土企业还缺乏直接大规模接受国外订单的资格，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三是对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的高度依赖。在加工贸易急速增长的背后，是 FIEs 企业对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和美日欧先进生产设备和流水线的不断引进。四是对于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加入国际生产链的绝大多数加工企业并没有形成自创品牌，而只是为价值链下游的美日欧的品牌商，或由其主导的二、三级经销商进行国际代工，市场营销的网络、渠道、品牌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都被国外高链节企业控制（刘志彪，2007）。

此外，樊纲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①：从对外贸易商品的技术结构和技

^① 樊纲等（2006）从国际贸易结构分析研究我国贸易产品的技术结构和技术分布的整体状况，并将贸易品按技术水平分为 4 个等级。

术分布的整体状况来看，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并没有得到实质性优化。如表 1-2 所示，单从数值上看，1995~2003 年期间，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下降 16%，到 2003 年，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已经不算很大；而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确实在增加，但只提高了 3%，远远没有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等技术产品已经是中国出口中的最大组成部分。然而，从演进趋势看，尽管中国的出口品技术附加值正在向高端移动，而进口技术结构仍然是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但总体上中国进口相对较高技术的产品，出口相对较低技术产品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换言之，我国外贸发展始终处于比较优势陷阱。

表 1-2 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的技术分组 单位：%

技术分组	2003 年出口	2003 年进口	1995 年出口	1995 年进口
低技术	26.2	17.8	42.1	24.9
中等偏下技术	29.1	14.9	29.9	19.1
中等偏上技术	33.1	35.4	19.6	30.0
高技术	11.6	31.9	8.5	25.9

注：数值表示每一类产品的出口（或进口）额在总出口（进口）额中的比例。转引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

(3) 贸易条件恶化，贫困化增长日益严重。大量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主要体现在研发、服务贸易出口和国外附属公司销售上，其价值增值大。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主要体现在加工贸易的大出大进上，其价值增值小。比如，1990~2001 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外附属公司销售增长率每年几乎都以 7% 的比率超过商品出口和非要素服务增长 (Grossman, Helpman and Szeidl, 2006)。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国家中的在国出口商品中，其价值增值均达 40% 以上；而在我国加工出口商品中，大约 1/4 的份额是国外中间投入品价值转移，国内商品的价值增值都只占 12% 左右（还没有剔除那些重新回到我国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在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上赚取的利润份额远不到 10%（洪联英等，2006）。卢峰（2006）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始终陷

在量大益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上，这种组织安排直接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直接拉动生产成本上升。跨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或零部件加工组装安排在我国进行，吸纳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参与到工资水平相对偏高的国际生产体系中，这样，出口产品的快速扩张直接拉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1978~1990年间年平均递增还只为3.8%，1990~2000年间年均递增至6.5%，但到2000~2004年间年均递增已经达13.3%。其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幅度更快，1978~2004年间年均增长达6.17%，相比之下，在1970~2004年间，美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长仅为1.29%，其他OECD国家也只为2.24%（卢峰，2006）。随着工资水平提高从而生产成本的上升，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3~2004年中国因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1.1%和2.1%。

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加剧了我国出口贸易出现贫困化增长的趋势，表现为出口产品普遍出现量增价跌的态势，如中国的鞋、球类产品在过去的10年里出口额增长了50%，而平均价却下降了20%以上。这使得相当多数量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靠国家的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才能维持生存。换言之，贸易增长与发展丧失了应有的微观基础。

综上所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外资企业数量等都取得跳跃式增长，但外向企业却没有强大、外向产业转型升级非常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政府“减顺差、促消费、调投资”的结构调整下，自2007年7月1日起，取消了553项以外向产业为主的“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降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及10项由退改免的出口商品退税率后，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都是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中小企业），其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广州日报，2008年8月4日），尤其在以外向经济较为活跃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更是高频出现了非正常的中小企业歇业、停产甚至“倒逼”现象。为此，商务